

近代以来中国西北边疆安全问题研究

丁建伟 赵波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以来中国西北边疆安全问题研究/丁建伟，赵波 著.

-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1

（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究文库）

ISBN 7 - 105 - 07443 - 4

I. 近... II. ①丁...②赵... III. 边疆地区 - 国家安全 - 研究
- 西北地区 - 近代 ~ IV. D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3401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13

金若龙文化工作室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20.375 字数：530 千字

印数：0001 - 1000 册 定价：40.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010 - 64271909；发行部电话：010 - 64211734）

绪 论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西北边疆是指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的阿拉善盟、鄂尔多斯市的西部，西藏自治区的阿里地区及甘肃省北部毗连国界的广大地区。总面积约 247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 25.7%，地域辽阔，纵深宽广。它地处欧亚大陆腹地，在历史上曾是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化融会交往的必经之地，在当代，是连接我国与南亚、中亚、西亚及欧洲的要冲，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边疆的安全与稳定，历来是一个国家国泰民安的体现。从遥远的古代起，西北边疆既是我国多民族生息、繁衍的地方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要道，又是国家统一安定与分裂动乱交替争斗的热点地区，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殊效应。正如江泽民同志 1998 年视察新疆时指出的：新疆的稳定和发展，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对我们实现跨世纪的发展目标，保障国家安全和边防巩固，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历代中央政府都十分重视对西北边疆的治理和建设。早在公元前 138 年的西汉时期，西汉王朝就通过派遣使者出使西域，在中原汉族和边疆少数民族之间架起沟通联络的桥梁。公元前 60 年，汉朝就在新疆设置了西域都护府，通过驻兵屯田和设立军政管理机构，行使对西北边疆的统治权。隋、唐时期，中央

王朝在西北边疆设州建府，册立可汗，有效加强了管辖。宋、元时期，虽然因中原汉族政权的更迭，西北边疆曾有过短暂的分割割据，但元朝政府经过前后 40 多年的平叛斗争，又统一了伊犁以东的广大地区，并设立了北庭都元帅府、提刑按察史、交钞提举司、宣慰司、织造局、西域亲军都指挥使司等军政机关，实行严格管理。明、清时期，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北边疆的管理。特别是在清朝末年，当中亚浩罕汗国阿古柏匪帮骚扰南疆、沙皇俄国武装占领伊犁，新疆面临从祖国版图分裂出去的危难时刻，钦差大臣左宗棠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援下，血战沙场驱逐外寇，收复新疆。随后，清政府设立了中央政府直属的省级行政区，强化了对新疆的有效统治，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和英勇精神，永远激励中华儿女自强不息。总之，千百年来，虽然西北边疆地区的“统”、“分”之争一直存在，但历朝历代中央政府对西北边疆地区始终行使着管辖权，西北边疆地区始终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西北边疆作为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屏障，其地缘政治位置的特殊性，在国家安全方面表现出独特的作用，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各个层面均具有深远影响。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缘战略意义，使之成为历史上大国势力竞相渗透和争夺的场所。自近代以来，在西北边疆地缘政治安全进程中始终存在着国外因素的作用。先是英国和沙俄在新疆的角逐与争夺；然后是苏联向新疆“输出”革命，以图使这一地区成为其安全缓冲区；接着是中苏关系由友好到对抗；冷战结束后，以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为代表的各种极端势力在中亚及其周边地区迅猛发展，并加紧与包括我国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在内的国际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相勾连，使中亚及其周边地区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中心和策源地之一，对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面对我国西北边疆地区安全与稳定

存在的许多现实的和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如何科学认识西北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如何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西北边疆安全理论，为有效维护我国西北边疆安全与稳定提供理论支持，是本书的主要出发点和归宿。

本书以西北边疆安全作为研究的主体，从历史的纵向和现实的横向对近代以来西北边疆地区安全与稳定问题进行比较考察，在研究中，既要以西北边疆地缘自身特点出发，又必须超越对其自身的研究，要在整个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利益的空间中来审视西北边疆安全变化特点及内部机制。通过这一研究，将影响西北边疆安全与稳定的内外部因素进行系统总结，以发现其独特规律，为西部大开发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西北安全环境，提供理论依据。基于上述思考，本书对近代以来西北边疆安全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目的和意义。

第一，对西北边疆安全问题进行总体性研究和理论分析，具有重大社会实践意义。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国内，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应对国内外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我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但是，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我国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的新形势下，国家安全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新挑战。特别是“9·11”事件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把反恐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以咄咄逼人的气势，高举反恐之大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打响了两场“反恐”战争。但耐人寻味的是以本·拉登为代表的国际恐怖活动，并未因阿富汗战争的胜利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倒台而销声匿迹，世界范围内恐怖活动呈继续升温的趋势。国际形势的这种变化，无疑给我国西北

边疆安全乃至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带来了许多新的不确定因素。因此，认真研究和分析西北边疆及其周边安全环境，事关我国国家战略利益的全局，对于强化西部边疆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确保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顺利实施意义重大。

第二，研究西北边疆安全问题，也是当前稳定局势的需要。西北边疆的安全与稳定，直接关系到全国的安全与稳定。历史是实践的基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西北边疆地区的特殊性，使得研究这一地区安全问题时，与其他地区相比，既有共同性，又独具其特殊性和历史的延续性。特别是自近代以来，影响西北边疆安全与稳定的根本性问题，就是分裂与反分裂、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因此，要清醒地看到，反分裂斗争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分裂中国的图谋进行斗争的继续，是维护我国当前稳定大局的重中之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维护西北边疆安全的质量和水平。

第三，本书以史论结合的方式，从历史的纵向和现实的横向上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力图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在构建 21 世纪初西北边疆安全理论方面做出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对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西北边疆的社会政治稳定和安全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研究现状述评

关于清代以来西北边疆安全问题的研究是随着清朝当代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不断深入而发展起来的。近代以来西北边疆安全问题的研究，时间跨度长，涉及国家、领土、主权和民族、宗教等敏感问题，情况复杂。从研究的现状来看，学术界一向把它视为禁区，很少有人问津，尽管很多研究成果或多或少都涉及西北边疆的安全问题，但以安全的视角专门研究边疆问题的成果并不

多见，且研究的侧重点也各有不同，主要集中在一些重大的历史性问题上。如阿古柏寇边，英俄私分帕米尔问题，俄英对新疆的文化掠夺等。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局限于帝国主义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侵略层面上，缺乏系统全面的比较研究。

从中国社会发展角度来看，清代康雍乾嘉时期古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边疆研究的外延和内涵均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在鼎盛形势下已酝酿着危机，到了道光时期以后，中国边疆危机日趋严重，边疆问题已与中国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问题紧密相连，此时的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的时代感和紧迫感也是空前的。从中国边疆学术发展角度来看，自明末清初以来，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与边疆问题研究发展虽有起伏，但从未中断，学术发展过程中的延续性在新的历史时期演化出了新的特点。下面就近代以来国内外涉及西北边疆安全问题的研究情况作一简要回顾和评述。

有清一代，边疆史地作为专门研究对象，是从嘉庆、道光年间开始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到 19 世纪时，清王朝社会内部问题凸显，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社会生产力水平停滞不前，国力逐渐由盛而衰，国家危机日益严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边疆危机初露端倪，尤其体现在西北边疆。19 世纪 20 年代的张格尔叛乱打破了持续近半个多世纪中国西北边疆和平安宁的局面，拉开了几乎持续整个晚清的西北边疆危机的帷幕。随着国家形势的日趋恶化，尤其是西北边疆地缘政治形势和安全环境的重大变化，动荡与危机相互交织，边疆安全问题已与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紧密相连。受此影响，从 19 世纪中叶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近代边疆史地研究曾掀起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晚清咸丰、同治、光绪年间，一批有识之士开始摆脱乾嘉以来所盛行的烦琐考据的束缚，转向“经世致用”，在研究中突出体现了日益浓厚的忧患意识。学术研究与现实，尤其是与政治

联系已经变得越来越为紧密。一些学者有感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而引起的边疆危机和边界问题，更为关注西北防务之道，政府政策之得失以及国家富强之道，加强了边疆治理、边事外交、边界舆图等方面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维护边疆安全的治边思想。

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至19世纪中叶以后（主要是嘉道咸时期），中国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在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和时代使命后经历了一个兴盛的时期。祁韵士可称为开这一时期边疆研究之第一人，他于1783年起负责编写《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历时八年而成其书。1805—1809年间被遣戍边城伊犁，参加《西陲总统事略》的编纂，在此基础上，著《皇朝藩部要略》十八卷及《表》四卷，对内外蒙古、厄鲁特蒙古、西藏、回部历史以纪年体，记述各部的分合演变。祁韵士还著有《西域释地》二卷、《万里行程记》一卷；编《伊犁总统事略》十二卷，后精简为《西陲事略》；又参与编纂《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徐松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因科场案流放伊犁，继续《西陲总统事略》的编纂。他又把祁韵士编《伊犁总统事略》加以增删修订，编成《新疆识略》十二卷。在新疆期间，徐松有机会遍访天山南北各地，做实地考察。他于道光元年（1821年），仿《水经注》的体例，撰成《西域水道记》五卷，以哈喇淖尔、罗布淖尔等十一大湖为纲，记述嘉峪关以西和新疆境内的水系湖泊，释文中参考史籍和亲历考察的结果，详记沿河的城邑、村庄、军台、卡伦、厂矿、交通、古迹、民族、史事等，对当地留存的碑志材料，也做了辑录。此外，徐松还撰有《新疆赋》二卷，用韵文体记述了新疆的山川形势和民族物产等情况。他还著有《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不仅比勘史料，多所订正，而且结合实地考察，指出今地所在，较前人高出一筹。陶保廉在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年）随父赴新疆任官，一路从山东、天津、北京，经陕西、甘肃，入新疆，由哈密，经吐鲁

番，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所著《辛卯侍行记》对沿途城镇沿革、山川道路、古迹名胜、人物风俗等均有记述，特别是对古今地名的比定，为今人所重。此外，还有一大批杰出的边疆研究专家，编著了一大批边疆史地研究新著，如松筠的《西招图略》、《伊犁事宜》、《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事宜》、《乌鲁木齐事宜》、《塔尔巴哈台事宜》；洪亮吉的《塞外纪闻》、《天山客话》、《伊犁日记》；沈垚的《新疆私议》等。特别是沈垚在《新疆私议》中通过对西北边疆地缘政治形势的比较分析，对维护新疆稳定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进行了论述，提出了以发展边疆经济促进社会稳定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另外松筠在其《西招图略》中，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其治边方略和抚驭之道。他认为，“守边之要，忠、信、笃、敬也”，^①“安边之策，贵于审势而行权……宜威则威，宜惠则惠。然后仁以厉其俗，义以作其气，惩贪除苛，使知节用爱人。并教以诚敬，示以忠信，虽蛮夷可冀知感畏矣。久之，众心我同，则民胞物与之化成，于时保之，小心翼翼，固可永安乐利也。”^②同时，还提出了在固边中“武备不可不修，操防不可不讲，爰绘散总之图，俾知舆地之险，固我疆隅，化彼觊觎”^③的国家安全思想。这种积极的边防思想对于稳固西北边疆安全和稳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清朝国势一落千丈，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山河破碎，国土日蹙，边疆危机日趋加深。此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又注入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华，保卫我国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不受侵犯的

① 《西招图略》，松筠序。

② 《西招图略》之“安边”条，1页。

③ 《西招图略》之“守正”条，29页。

新的动力和内容，一批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抵御外侮，巩固边防，且以开发边疆、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统一之究心时务，关注现实的“经世致用”的精神著称于世。这主要表现为新兴的中国边界问题研究和涉及边疆问题的中外关系问题研究不断发展。其中，西北边疆地区由于其地缘政治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民族成分的复杂性、文化形态的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特殊性而备受学者的关注和研究。龚自珍、魏源、张穆、何秋涛、梁廷楠、夏燮、徐继畲、曹廷杰等为此时的著名学者，他们本着探究边陲史地，谋求保国固边的务实态度，旁征博引，认真考证，研究的内容大量牵涉有关西北边疆安全的问题。如魏源《海国图志》、《圣武记》；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蒙古图志》（仅存序若干篇）；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朔方备乘》；梁廷楠《夷氛闻记》；夏燮《中西纪事》；徐继畲《瀛环志略》；曹廷杰《西伯利东偏纪要》；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姚莹《识小录》等著作。此外，清朝各级官府编纂的部分史志，也反映了当时西北边疆史地学之兴盛。这类史志主要有：《大清一统志（西北部分）》、《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五十二卷，乾隆二十一年至四十七年（1756—1782年）修成；王树楠、袁大化编《新疆图志》一百六十卷，宣统元年至宣统三年（1909—1911年）修成，等等。这些文献都是既参考了历史文献，又有实地考察成果的大型地方通志，为西北边疆史特别是清代新疆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综观上述研究，正如吕一燃先生所言，“在中国社会由古代发展阶段向近代发展阶段的过渡时期，中国边疆研究也迎来了一次发展高潮，这次高潮酝酿于康雍乾嘉时期，形成于嘉道咸时期。边疆研究成为‘显学’的社会基础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而其学术思想基础则是经世致用思想的再兴与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一批边疆研究者显示出他们执著的敬业精神和

深邃的学术造诣。”^①这些著作是边疆研究宝贵的历史遗产，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为西北边疆安全问题的研究者所重视。

20 世纪前半叶，中国边疆研究逐步演进为一门发展中的现代边缘学科。中国学者运用资产阶级史学研究方法，从不同范围、不同层面、不同视角、不同方法对中国西北边疆进行多元研究，出现了大批有关中国边疆和疆域历史变迁的宏观综论的史作。也正因为有了这许多成果的问世才撑起了这门发展中的现代边缘学科的构架。而这些众多的成果又大多是本时期中国爱国救亡运动的产物。与 19 世纪后期中国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状况相比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高潮阶段，这与当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高潮一致，是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的。当时沙俄长期以来对我国北部边疆的分割和侵占，英国侵略西藏，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大举进攻，不仅使中国边疆的形势依然严峻，而且使中华民族陷入了新的危机中。而此时的西北边疆正处于英日俄等列强的争夺之中，他们的势力此消彼长，使西北边疆始终处于动荡和危机之中。值得庆幸的是，外来的挑战促进了国人的觉醒，一批具有现代社会意识和现代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开始从国家兴亡考虑到边事盛衰，从研讨边疆全局大势到考察边疆局部问题，从分析国内边疆问题联系到中国周边及世界格局，^② 以中国边疆整体角度出发，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地理等诸多领域观察研究西北边疆安全问题。具体表现是：成立了中国地学会和禹贡学会等边疆研究团体，创办了《中国边疆》、《边事研究》等十多种研究边疆问题的专业刊物，编辑了多种“边疆研

① 马大正、刘澂：《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60～61 页，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

② 马大正、刘澂：《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77 页，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

究丛书”和边疆省区的通志，开展了对西北边疆等边疆地区的考察活动，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论著主要有：许景澄《西北边界地名译汉考证》（上海藻文书局，1902）、阚凤楼《新疆大记》（1907）、国民外交丛书社编《新疆问题》（上海中华书局，1928）、华企云《新疆问题》（上海大东书局，1932）、《中国边疆》（新亚细亚学会，1932）、洪涤尘《新疆史地大纲》（南京正中书局，1935）、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6）、蒋君毅《新疆经营论》（重庆正中书局，1939）等是此期研究中国治理西北边疆问题的代表作，其中对英属印度和阿古柏的关系，英国和中国新疆界务及商贸均有论述。而同一时期论述中国西北边疆问题的论文数量则更多，主要有：允与《俄人测量帕米尔之警告》（《地学杂志》，第4卷，第5期，1913）；君实《中国边疆之危险》（《东方杂志》，第15卷，第7期，1918）；翰青《边疆问题——注意的理由和解决的途径》（《清华周刊》，第30卷，第8期，1928）；格桑泽仁《亚洲问题与中国边疆问题》（《新亚细亚》，第1卷，第1期，1930）、戴季陶《中国边疆之实况序言》（《新亚细亚》，第1卷，第5期，1931）；黄定初《帝国主义侵略下我国边疆之危机》（《边事研究》第2卷，第5期，1935）；华企云《中国近代边疆沿革史》（《新亚细亚》，第9卷，第4期，1935）；孟英庾《英俄日角逐下之新疆问题》（《新亚细亚》，第9卷，第2期，1935）；《中国近代边疆界务志》（《新亚细亚》，第9卷，第2期，1935）；《中国边疆之勘界与失地》（《新亚细亚》，第2卷，第2期，1936）；曾延仲《列强在新疆势力之解剖》（《时事月刊》，第13卷，第2期，1935）；黄定初《帝国主义侵略下我国边疆之危机》（《边事研究》，第2卷，第5期，1935）；杨青田《现阶段中国边疆问题》（《中华月报》，第2卷，第6期，1934）；章力生《边疆与国防》（《军事与政治》，第3卷，第6期，1942）；沈山剑

《怎样研究边疆问题》（《图书展望》，第2卷，第2期，1936）；顾颉刚《边疆问题》（《甘肃学生》，第8卷，第1期，1938）；孙绳祖《中国边疆问题发生原因之探讨》（《边疆研究季刊》，第1期，1940）；荆三林的《近代中国经营边疆史》（中国文化服务社陕西分社，1942）；顾颉刚《中国边疆问题及其对策》（《西北通讯》第3-4期，1947）；马鹤天《今后的中国边疆与边疆问题》（《中国国疆》，第1卷，第3、4期，1942）；毕燕士《中国边疆之两大瓯脱地——帕米尔和江心坡》（《新亚细亚》，第2卷，第6期，1931）；倪志书《帕米尔与帕米尔问题》（《新亚细亚》，第8卷，第1期，1934）；余寄《新疆省内英俄两国之冲突》（《政治评论》，第92期，1934）；江枫《南疆事变与帝国主义侵略边疆界务志》（《新亚细亚》，第9卷，第2期，1935）；茹春蒲《我们以前漠视边疆的原因与现在注意边疆的要点》（《前途》，第3卷，第9期，1935）；《中国近代下之新疆》（《边疆》半月刊创刊号，第1卷，第1期，1936）；孙荣元《新疆问题与英俄帝国主义》（《天山月刊》，第1卷，第3期）；曾延仲《列强在新疆势力之解剖》（《时事月刊》，第13卷，第2期，1935）；赖徽《俄英日角逐新疆之分析》（《西北问题季刊》第1卷，第1期）；《中国近代边疆失地史》（《新亚细亚》，第7卷，第6期，1934）等论文。此外，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是此期研究中国治理西北边疆的代表作，该书从中原王朝的角度，全面考察了西北边疆史，其中对英属印度和阿古柏的关系，英国和中国西北边疆界务问题均有相当论述。李寰《新疆研究》（中国边政学会发行，“亚洲民族考古丛刊”的第五辑，1944），该书简述了中国历代对西北边疆的治理，而对清末及民国的新疆则分专题进行了详细研究，其中外交、对外贸易等均涉及新疆和英属印度的关系，是一部偏重于务实的研究性专著。吴蔼宸《新疆游记》（商务印书馆，1935）叙述了他在30年代初新疆动

乱时在新疆的见闻，其中有对南疆独立事件的记述。吴其玉《清季回疆独立始末及其外交》（《国闻周报》，第11卷，第11期，1934）详细叙述了阿古柏入侵新疆及其灭亡的过程，特别是对英勾结阿古柏、支持阿古柏的历史背景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对阿古柏的外交策略和外交活动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此期关于中国近代西北边疆边患和边界的综合研究也颇有成绩，如苏演存《中国境界变迁大势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谢彬编《中国丧地史》（中华书局，1934）；如林竞《新疆纪略》（商务印书馆，1935）对英属印度在南疆的种种活动的记述和分析。此外还有，方保汉《近代边疆政制述略》，华企云《中国近代边疆经略史》，玫萱《清代边疆行政》，楚明善《清代之治边制度与政策》，陈芳芝《清代边制述略》，丁实存《伊犁将军设置之起因与其职权》，安文惠《近百年来新疆的政治沿革》，夏威《中国疆域拓展史》，蒋君章《中国边疆史》，童书业《中国疆域沿革略》等。

19世纪50—60年代，沙俄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边界条约，割占了中国新疆边境和东北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随之批研究中俄边界问题的书籍先后问世，其中以钱恂的《中俄界约勘注》，邹代钧的《中俄界记》，王树楠的《新疆国界志》等最为著名。在这些著作中，作者根据确凿的历史事实，揭露了沙俄对中国的侵略，鞭挞了清朝官吏的昏庸卖国，充满着痛国土之沦丧的爱国之忱。书中对于边界线的走向，有关山脉河流的位置，也做了认真研究。此外，还有一些著作是直接为外交斗争和边防建设服务的。如钱恂《帕米尔私议》，海英《勘分帕米尔图说》，曹廷杰的《西伯利东偏记要》等。^①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几乎遍布20世纪前半叶的50年间，

^① 吕一燃：《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2页，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但以 30 年代最为集中，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形成于此时的研究之盛况。这些论著在述及清政府对西北边疆的统治时，都涉及对清代西北边疆安全稳定政策的连带论述。应当承认，由于历史的局限，其时研究者专业还没有严格的确定，不少有分量的论著主要着眼点只是从传统的政治史和典章制度史的角度进行了历史顺序的梳理，所以对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尚不系统全面，但其突出的一个成就是把中文史料做了许多分类整理。尽管“这些论著在今天读来，存在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欠缺，甚至错误，但称它们是中国边疆史宏观研究的开先河之作当不为过。”^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历史科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国通史和各朝代断代史的深入研究以及中国民族史、地方史、中外关系史诸多领域的发展，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开创了良好的发展前景。边疆史和历史地理与现实关系特别密切，有关的学者在为现实服务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历史地理研究从传统的沿革地理向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发展。顾颉刚、章巽合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部分）出版于 1956 年，开我国综合性历史地图集之先河。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1~8 册），以历史文献记载为基础，吸收考古、地理、民族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历史成就，是一项重大的学术工程。

20 世纪 60、70 年代，中国史学界由于受极“左”思潮的严重影响，加之我国对清朝断代史、民族史、边疆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还未及全面展开，因此，以边疆史的视角对清代以来西北边疆安全问题的研究相对滞后，发表的论著甚少。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摸清我国各民族情况，组织专家、学者和民族工作者进行少数民族识别工作。通过对中国少数民族历

^① 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19 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

史、语言、社会形态、文化习俗的综合调查，初步弄清了各地群众的族属问题。1956年，在综合调查基础上，初步确定了我国51个少数民族（后增加到55个）。1956年，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蓬勃开展，社会面貌发生了急剧变化。根据中央指示，1958年，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有关单位，在编写《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简志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的同时，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历史调查，在此基础上编写了《维吾尔族社会历史调查》、《柯尔克孜族社会历史调查》、《塔吉克族社会历史调查》等调查报告，并公开出版发行。尽管上述调查报告没有多少直接论及西北边疆安全问题的内容，但对于研究近代以来西北边疆安全与稳定问题仍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呈现出勃勃生机，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个亮点，硕果累累，而且其学术研究的内涵与外延，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总体发展的基础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突破了以近代边界问题为单一研究的范畴，而将其扩展为以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为研究重点，促成了中国边疆史地基础研究的大发展；二是突破了边疆史地的研究范围，将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的研究相结合，直面当代中国边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① 近代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和“我国的边疆史地研究的总的发展情况

^① 马大正：《关于边疆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1）。

一样，虽然经历了曲折，但是毕竟获得了恢复和深入的发展”，^①边疆研究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在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国民族史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从原来单一地研究帝国主义对西北边疆的侵略史，到多领域、多角度的综合性研究，尤其是对一些重大问题的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涌现了一批堪称经典的学术之作。根据有关资料统计，此期出版学术专著 24 部，资料书 3 部，发表学术论文 68 篇。^②从内容上看，多以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我国边疆、歌颂我国边疆地区人民反侵略斗争为主。从边疆区域上讲，则以涉及西藏、台湾和北疆地区的为多。尽管有些著述带有一定的宣传色彩，但是也有些著述表现出了较高的学术水平。丁名楠、余绳武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 1、2 卷）^③是我国对帝国主义列强侵华史进行综合性研究的第一部著作。该书从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华的角度，不仅运用了丰富可信的中文资料，而且参阅了大量外文资料，使用了大量的档案和外文资料，包括外文档案，系统地论述了 1840 年以后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其中以相当的篇幅论述了俄英帝国主义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侵略。由西北大学、兰州大学等共同编写完成的《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人民出版社，1979），该书以详实的史料全面概述了从 17 世纪到 20 世纪中叶沙俄对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侵略和蚕食，同时追述了这一地区中俄边界的历史沿革，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对于帕米尔问题、巴尔喀什湖问题、伊犁问题等，书中都有详尽的论述。此间，还出版了几部有关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的专著，即复旦大学历史

① 马大正、刘澍：《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63 页，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

② 赵云田：《50 年来的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载《近代史研究》，2000（4）。

③ 丁名楠、余绳武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 1 卷，科学出版社，1958 年初版；（1961 年改人民出版社出版），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